

郭小东 著

中国知青部落

中国知青部落三部曲

第二部：

青年流放者

不要说桥已塌，船已沉，山路已断

不要说故事已老，歌已旧，部落已流放

那是你想留也留不住的



1247.57/330

郭小东 著
中国知青部落三部曲

中国知青部落

第二部：

青年流放者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知青部落. 第2部/郭小东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1.6

ISBN 7-5360-3534-9

I. 中... II. 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3696 号

中国知青部落 (第二部)

青年流放者

郭小东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中山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中山市火炬开发区逸仙路)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19.625 印张 5 插页 450,000 字

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ISBN 7-5360-3534-9

I·2924 定价: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郭小东

生于兔年兔月兔日兔时，

作家、评论家、教授，其著作曾多次获奖。

主要著作有专著《中国当代知青文学》、《诸神的合唱》、《逐出伊甸园的夏娃》、
《知青人信札》、《文学的锣鼓》、《转型期文学风度》；

中篇小说集《雨天的曼陀罗》；

散文集《南方的忧郁》；

长篇小说《中国知青部落》三部曲：《1979：知青大逃亡》、

《青年流放者》、《暗夜舞蹈》。

SBW/84/04

总序 追寻“知青人”的精神家园

陈骏涛



郭小东与陈骏涛-(左二)

在 20 世纪和 21 世纪交界的四五天，我一直沉浸在电脑上阅读郭小东的《中国知青部落》第三部《暗夜舞蹈》。这是我此生第二次在电脑上读这么长的东西。过去读小说都是捧着一本书，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或靠在床上看，如今却只能用一个姿势，死劲地盯着电脑屏幕，一边看一边还得不断地删除那些与正文无关的各种符码，才能顺当地读下去。坦率地说，这对于一个早已过“耳顺”之年的人来说，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我还是认真地把这部 30 余万字的长篇读完了，而且我庆幸我这四五天的辛苦并没有白费，因为我读到的是一部真正用自己的心血浇灌出来的，而不是靠技巧编造出来的好书。同时，我为郭小东终于完成了他的《部落》三部曲而感到高兴。这是他耗费了 12 年时间完成的一个浩大的工程（约 100 余万字），无疑是作为“知青作家”的郭小东的一部最重要的作品。

对郭小东的《部落》三部曲，我是一个跟踪阅读者。大约在 10 年以前，当《部落》第一部《1979·知青大逃亡》初版的时候，我就读了它，稍后还看了根据这部长篇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1994 年，当《部落》第二部《青年流放者》出版的时候，我还跟郭小东搞了一个长篇对话，当年的《作家报》曾用几乎两个版的篇幅刊登了对话全文。在那篇题为《精神的守望者》的对话中，我表达了这样的思想：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除了应该有物质作为基础，作为依靠以外，还必须有精神的支撑。特别是对于人文知识分子来说，如果没有精神的追求，灵魂就无所依附，生活就没有意义，生命就会枯萎。所以，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人正在或已经成为物质的奴隶，物质追求压过了精神追求的情况下，《知青大逃亡》和《青年流放者》的出现是很难得的。这两部小说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表现了作家的一种精神上的追求，映射出一种理想的光华。书里面的人物，大都有一

种自强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成功者中的一类人如肖邦，他是一个名作家了，但并没有陶醉在成功之中，甚至淡薄名利，非常不满自己的生存状态；成功者中还有一类人如林尤福，他腰缠万贯，身上也有一些劣根性的东西，但他还极力想做一点好事情，为知青朋友做贡献；失败者也不甘心成为失败者，如那个修单车的罗隆基，他流落街头了，但他内心深处的那种自尊自贵是谁也不能去侵犯的，他依然钟情于文学，还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即令是退隐者，如那个看守公墓的麦灿辉，表面上看，他似乎已经淡出喧嚣的尘世了，但其内在的精神火花并未熄灭，依然充满着道义感和良知，在许多知青人的心目中，他还是一个精神领袖。

这些言论在欲望膨胀、弥漫着商业主义氛围的今天，似乎是很不合时宜的，对于某些人来说，什么精神，什么理想，通通都是空洞抽象的东西，只有抓住机会、实现个人的欲望才是最实在的东西。然而我如今读郭小东的《暗夜舞蹈》，分明又感到有一种精神的幽灵在游荡着，他似乎并没有抛弃他多年以前的“知青情结”和“古典情怀”，他还在书中怀想着什么，追寻着什么，他始终被一种叫做人文知识分子的责任心、忧患意识、人格力量和宿命感所纠缠着。这突出地表现在书中的主人公李斯特身上。从《知青大逃亡》的方炜，到《青年流放者》的肖邦，再到《暗夜舞蹈》的李斯特，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这就是人文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那种矛盾、痛苦和忏悔，他们的道义感和良知，他们的人道精神和体恤情怀，他们苦苦地追寻着以往曾经珍惜过，如今却变得有些茫然的了的精神家园，但这种追寻的结果依然是一片茫然。郭小东说，他写作《暗夜舞蹈》时就像是“在暗夜里跳舞”。我想这就是一种茫然的精神状态。李斯特的失踪，正是一个具有出众才华和孤傲情怀，又怀抱着某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的人文知识分子的一种茫然的、悲剧性的

结局。“应该消失和行将消失的东西，是谁也无法阻挡的。犹如那残阳如血，它以无比雄壮的沉落告知我们旭阳是如何诞生的。我们没有理由吁叹这种辉煌的沉落。生命将以它最后的呐喊，把自己归于平静，归于无声的奔腾。我走了，但是我走了吗？”李斯特这样写道。整部小说贯穿着一种悲伤的基调，弥漫着一种悲剧性的氛围，我在阅读过程中，就这样地被这种氛围所裹胁而欲罢不能！

小说的基调和氛围是受到作者创作情绪的制约的，尤其是对于像郭小东这样主观情绪比较强烈、感情色彩比较浓重，具有某种浪漫主义气质的作家来说，作者的创作情绪是很容易在他的行文中表现出来的。郭小东不是一个为文造情的作家，而是一个因情生文的作家，即令在虚构性的作品如长篇小说中，亦是如此。以我的阅读感受，在《部落》三部曲中，作者的创作情绪是有一个发展轨迹的。在写作《知青大逃亡》的时候，作者是充满着激情的，他激情地回望过往苦涩和艰辛的知青岁月，整部小说笼罩着一种苦难感和悲壮的氛围，作者还不时地站出来代替人物发表激情的言说。到写作《青年流放者》的时候，这种激情有所减退，尽管他也回望过往的岁月，但他着重表现的是知青返城以后各种不同的命运和遭遇，他们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的追寻，反思的成分显然加强了。而到写作《暗夜舞蹈》的时候，他的情绪显得沉静、淡泊了，似乎在用一种淡定透彻的眼光反思、省思过往的岁月，以及当下生活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暗夜舞蹈》在结构上有一个很精心的安排，即在每一章的末尾都穿插了“另类档案·追寻昨天的传说”，用知青后代的视角来追寻、省察他们当年父母的情感历程，而不是像作者以前喜欢做的那样，以知青当事者的身份出来现身说法，这也是作者的情绪转向沉静、淡泊的一个证明。我现在还不能充分地阐明作者的创作情绪之所以发生如此变化的深在原因，我只

能笼统地将其归因于这是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生活的演变在作者的创作心路上所留下的印痕。

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影响深远的运动。在大约1700万的未成年人正处于长身体、长知识的阶段，正需要他们专心致志地从事学习的时候，这场运动却整个改变了他们以及他们家庭的命运，从而造成了一代人的精神创伤和中国文化的断层，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历史已经证明，这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由于错误的决策所发动的一场错误的运动。郭小东以未满15岁的年龄就到海南岛黎母山区落户，在那里生活了整整7年。知青生活给他的人生刻上了永不磨灭的印记，他说：“黎母山给我的全部爱情和屈辱，几乎是均等的。”从80年代到90年代，郭小东始终钟情于知青题材的写作，他是少数既从事知青文学创作，又从事知青文学批评的“知青人”之一。1988年，在《知青大逃亡》出版之先，他就出版了关于知青文学的研究专著《中国当代知青文学》。这部本应写成类似专题文学史那样的著作，实际上却如饶芃子女士所说，是“郭小东以其体验对新时期知青文学的论证和解释”（《中国当代知青文学·序》），灌注着相当浓郁的作者个人的人生体验和主观感情色彩。他的文学批评是如此，他的文学创作自然就更是如此。

有些青年朋友可能不理解，为什么郭小东这一辈人会有如此深重的“知青情结”，已经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何必一而再再而三地去翻老皇历呢？还是面对此时此地的生活吧！这也许正是两代人的一种隔膜。对于郭小东这一辈人来说，知青历史曾经是他们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给他们留下的是刻骨铭心的记忆，要他们忘掉这段历史，抹掉这段记忆，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具有“知青情结”，可能还正是“知青人”良知的一种表现呢！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把这段

经历写下来，这对死者是一种祭典，对生者是一种抚慰，对后来者也可能提供某种启示。这也是“知青作家”与“五七作家”相近的地方：他们的创作都背负着历史，都有或轻或重、或多或少的“负重感”，而不像某些没有经历过那些岁月的年轻作家那样，可以很轻松地宣告自己与历史的断裂，并且不承担某种责任或使命。这大概也正是两代人所不同的地方。

当然，毕竟这场运动已经过去了30年，如果再停留在或诅咒或缅怀的初级水平上，就远远不够了，应该有所提升，应该以更开阔的视野面对当下和放眼未来。从这一方面来说，提出“告别知青情结”（张抗抗）又是适时的。郭小东本人也提出过“要从一种对自伤、自恋、自命、自怜的情结中蝉蜕出来，这是一种痛苦的蝉蜕。”《部落》三部曲之所以值得重视，就因为它既不像70年代末的“伤痕文学”那样，主要在陈述“知青人”的不幸和灾难，也不同于某些持“青春无悔”主张的知青作品那样，主要在缅怀逝去的知青岁月、搜寻美好的记忆，它不是孤立地、脱离全民族的境遇去表白一代人的苦难或崇高，而是尽量超越知青个体的境遇，试图以更深邃的眼光，更宽广和深长的时空意识，对知青文化的正、负两个方面进行较为清醒的观照，对“知青人”返城以后的生存状态和不同境遇以及他们的思考和追索作出有深度的反映。郭小东是个感情型兼思想型的作家，《部落》三部曲在灌注着作为“知青人”作者的浓郁的感情色彩的同时，又是充满着理性思考的，这种理性思考突出地表现在它的反思倾向上。当然，这也带来了这部小说一定程度的理念化的倾向，包括作品中的某些不必要的议论（主要在第一部中）以及略嫌缠结的语言（这一方面在第二、三部中渐趋淡化）。我这里无意于对《部落》三部曲的理念化倾向作或褒或贬的评价，我只是说出我的这种感觉。每一个作

家都有自己的创作路数，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读者群，这种长期形成的创作路数是很难改变的，事实上也很难作出绝对的或肯定或否定的评价。

《部落》三部曲即将由花城出版社重版了。1989年，郭小东的一部文论集《诸神的合唱》在花城出版社出版时，我曾为之写过一篇序，如今他又邀我为他的这套书作序。我作为一个跟郭小东有将近20年交往，又看着他从青年时代走到中年时代的老朋友，自然不容推辞。但是，越是接近的人，可能看问题会越不客观。因此，上面的那些意见，只能算是我个人的一点读后感，决不是对《部落》的全面评价。对《部落》的全面评价，我想还是留给其他评论家和读者吧，他们对《部落》的意见（包括对它存在问题的提出和分析）可能会更加客观，更加公正，对郭小东本人也更有意义！

2001年1月20日凌晨写毕于北京天命斋

自序

流放者说



郭小东与导师王富仁先生（左）

又是黄昏，又是深秋的黄昏。

记得五年前也差不多是这样的季节，我写完了《中国知青部落》。那时，一种激越的，来自对一个已经消逝的时代，和那个时代所发生的历史真相所由的情绪，化成笔下的人物、故事、情节和一幅幅同时代人曾经的风景。这风景被固定在那部后来发行了许多万册，又被改编为八集电视连续剧的《中国知青部落》中。那时，我并没有因为它的完成而有丝毫轻松和成功的欣喜——因为书的前途未卜，我不知道它被送到出版社的编审那儿会是一种什么结局。尽管浙江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陈先荣已经阅读过全书且作了首肯，声明很快将发排，当时浙江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温小钰（已故）也表示对此书出版的关注并请陈先荣代转谢意——我知道在将其摆上新华书店的书架之前，它的命运一定是未卜的。果然，《中国知青部落》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小说室呆了将近两年。那是1987年10月——1989年8月。其间有几次传来即将付排的消息。我请花城美术编辑苏家杰设计了封面，那封面很有些抽象，是两个裸体的男女，男的跪着、女的站着，背景是一片迷蒙，似乎是伊甸园中，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时的一瞬间。我以为那封面设计得很杰出，是深知我作品的某些意绪的。可惜后来这封面已无法找回了。

在这两年间，在海南偶遇蒋子丹。她是一位很有个性也很灵秀的女性，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无边的边地》是经她的手，推荐给当时《芙蓉》的小说编辑王璞的。我们有过一些匆匆的交往，诸如在1986年的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上的邂逅等等。她从陈剑晖处拿到我这部小说的复印件，又推荐给她原来任职的刊物《芙蓉》。大约有一年的时间，稿子被退回来，为此蒋子丹还表示深深的歉意。我已经万分地感激她了。

1989年8月，那场风波刚刚过去。那些日子我常奔走

于海南广州之间。海南建省，我正谋求到海南去。海南文联的冯秀枚大姐说他们创刊不久的刊物《海南风》需约一批稿，希望我与晓剑给编上一期。那时候，到哪儿约稿？于是我们商量，把各自的一些作品挑一点出来，编成一期。于是我把《中国知青部落》的楔子和其中的几个章节，编成题为《一九七九·知青大逃亡》的纪实文学，发在第六期的《海南风》上。这一期也便是《海南风》的终刊号。发行人彭想林获得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那一期发了差不多五六十万份。我在许多地方都看到有关它的印刷精良的海报。这篇被浓缩了的东西可看作是《中国知青部落》的广告式文学。它与后来罗元先生发行《中国知青部落》获得空前成功关系密切。

1990年5月，彭想林介绍他的朋友罗元来找我，说可让他发行《中国知青部落》。我们和花城出版社的小说编辑田瑛相约在东山宾馆的“地吧”见面。罗元先生对此书十分感兴趣，虽仍无太大把握，但表示可以尽力而为，会有较大的发行量。我们还谈了封面等等事宜。大约谈了两次，便基本敲定了该长篇小说由花城出版，请罗元先生策划发行。

此后大约一个月的时间，我与田瑛协助罗元先生跑印刷厂，找人搞封面设计，反反复复，终于敲定了用得过大奖的《枫》的连环画中的一些画面组接，作为封面推出。又过了一个月，《中国知青部落》正式上市，发行得很顺利。其间不断有好消息和坏消息传来。上海《文汇报》率先转载了其中“五万知青集体请愿，向中央送交血书，要求回城”的章节，用了整整一大版。各种文摘刊物也纷纷摘其扼要部分。随后，由我的朋友田瑛、李林和王炳护策划，在北京召开了由《当代》杂志社、中国现代文化学会、《文学自由谈》、花城出版社联合召开的作品讨论会。知青作家梁晓声和首都的一些批评家参加了会议，各报都发了消息，把

《中国知青部落》推向评论潮流之中。

面对《中国知青部落》当时的情状，我保持着一种清醒的克制。我非常明白人们对它的接纳，皆因它在某种意义上写出了一些知青曾经经历的真实。我在自序《南北方的痉挛》中已经写尽了我对它应该说和已经说的话。

在这本书发行了两三月之后的1991年1月，我去了泰国，先是作为《潮之阳》专题片的撰稿人出访，后来因为探亲再度赴泰。鉴于当时个人的一些原因，本想移民泰国，但思虑再三，无法了断已经形成的生活格式，深味人在异邦那种无根浮萍的惆怅和苦恼，于是终于回国。这一次只在泰呆了一个星期，令在泰的叔公等亲戚感到诧异。那时，泰国和美国的《世界日报》都报导了《中国知青部落》的消息。这也是触动我尽快回国铲灭移居异邦的一个原因。离开了固有文化氛围，我将一事无成。那时我已开始酝酿第二部《青年流放者》的写作。人到中年。已经没有重新开辟新地的胆量和热情。何况有许多值得写一直想表达出来的东西，在等待呼之欲出的机缘。

本来，我已与花城小说室编审廖文先生约定，1991年4月将《青年流放者》交由他出版发行，他为此报了选题。在1990年底，我确信自己能够按时把《青年流放者》的稿子交给廖文先生。但突如其来的一些事完全搅乱了这个计划。

先是赴泰，从1月至3月。再后来的两年，便完全陷入筹拍《中国知青部落》电视剧的沼泽中。了无尽期的商议，想方设法的调度。与袁军，与沈冠祺、吴启泰、杨苗青、曾日华诸君，大家都花了许多精力投入电视剧的改编与拍摄。那是真正的焦头烂额。直至1993年3月，八集电视剧拍竣，分别在中央电视台一、三套节目和十几个大城市的电视台播出，又在北京、上海、广州、汕头召开了规模很大的首播式和研讨会，搞得沸沸扬扬。3月，在北京梅地亚的每个夜

晚，我们都为筹备会议和一些另外的突然发生的事忙到午夜以后，凌晨二时，到严寒中的北京街头去寻找“涮羊肉”的地方，和袁军、黄琦、王炳护一起喝二锅头，喝得酩酊大醉，“打的”回到梅地亚，已经是天将黎明。

片子蹒跚地播出之后，天津人民出版社又以很快的速度印行了经过我修订的《中国知青部落》。三版印刷发行的结果也很令人满意。这其中难为了王炳护和吴勤，他们为此书三版付出了许多热情和努力，自然也经受了許多曲折。

我之所以在《青年流放者》脱稿时写下上述文字，皆因作为《中国知青部落》第二部的《青年流放者》，是投注了我在《中国知青部落》中未竟的思考和现实的某种热情的。

《中国知青部落》出版发行之后，我从可能搜集到的反馈中，包括对一位经历残酷的湖南老知青给我的信的思考，他把我当作包青天，希望为之请命。西双版纳知青请愿的始作俑者、云南知青丁惠民先生也给我来信，直问我敢不敢真正面对知青的历史真相，并约我去重庆与他长谈，他愿意为我提供更多的资料。我感激他的热诚，已决定了去重庆的日子，然多次与他联系未果。他再没有复信。对《中国知青部落》的评论，包括对它的批评，都让我不得不认真地反思我自己，以一种更客观的态度，去面对曾经关联一代人生死的中国知青运动。

自1990年之后至今三年多的时间里，知青文学转向了更为纪实的方面，文学性的削弱和纪实因素的加强的标志是，各种以地域界定的知青实录文本层出不穷，大致是些知青生活的片断回忆。这些作品以其纪实的真实成分使以往的知青小说相形失色。但我相信，这种失色是暂时的。它们振聋发聩于一时，令人耳目一新。但是，滋润长久的依然还是那些扎根于生活与历史真相，精心编撰创作的知青文学。纪

实的回忆录作为知青文学的一个阶段性现象，它的历史作用是不可抹杀的。它使知青作家们认真地思索知青文学的走向，应该向一个怎样的层面掘进？那就是彻底抛弃粉饰和以成功者的反思去看中国知青运动。

知青们所曾经历的苦难，一定是人类苦难的一部分，也是平民的苦难的内容。它的苦难虽然发生于知青时期，但却真正作用于知青后时期，且成为一种精神苦难，也即知青回城之后直到他们走完人生道路之间这个漫长的时段，它的阴影是很难驱逐并且也无法了断的。

如果说在《中国知青部落》中，我还不是十分理性地去面对知青在非常时期的命运的话，那么在《青年流放者》中，我是以十二分的理性去面对许多作为平民的知青，而且把这种理性的努力，实践于对他们的心理分析中。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对，还是错。

从1993年的夏天到秋天，也即从4月到10月，断断续续地写作了六个月，终于写成了这部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在7月，广州最炎热的月份，整整一个月，我大部分时间关在屋子里，背对着呼呼作响的风扇，日以继夜地写作，我不知道我会写多少个人物？将会写多长？我只是凭藉我的经历中、我的社交中众多知青们赋予我的灵感，去作一种生活的记录。他们不断走进我营构的小说世界中，成为其中的人物。我只要循着这些人物可能的轨迹去写作就可以了。许多原来拟就要写的人物消失了，许多从未考虑过的人物，却以他们在生活中的真面，直迫于我，而使我不得不重视他们，给他们一席之地。

严格说，我从没有想过，要给这部长篇小说以严密的结构框架，以独特的人物关系，以殚思竭虑的小说基调——我想，这些固然是一个小说家通常要考虑的问题，但绝对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我只是希望，我一定要最真实地把生活于社